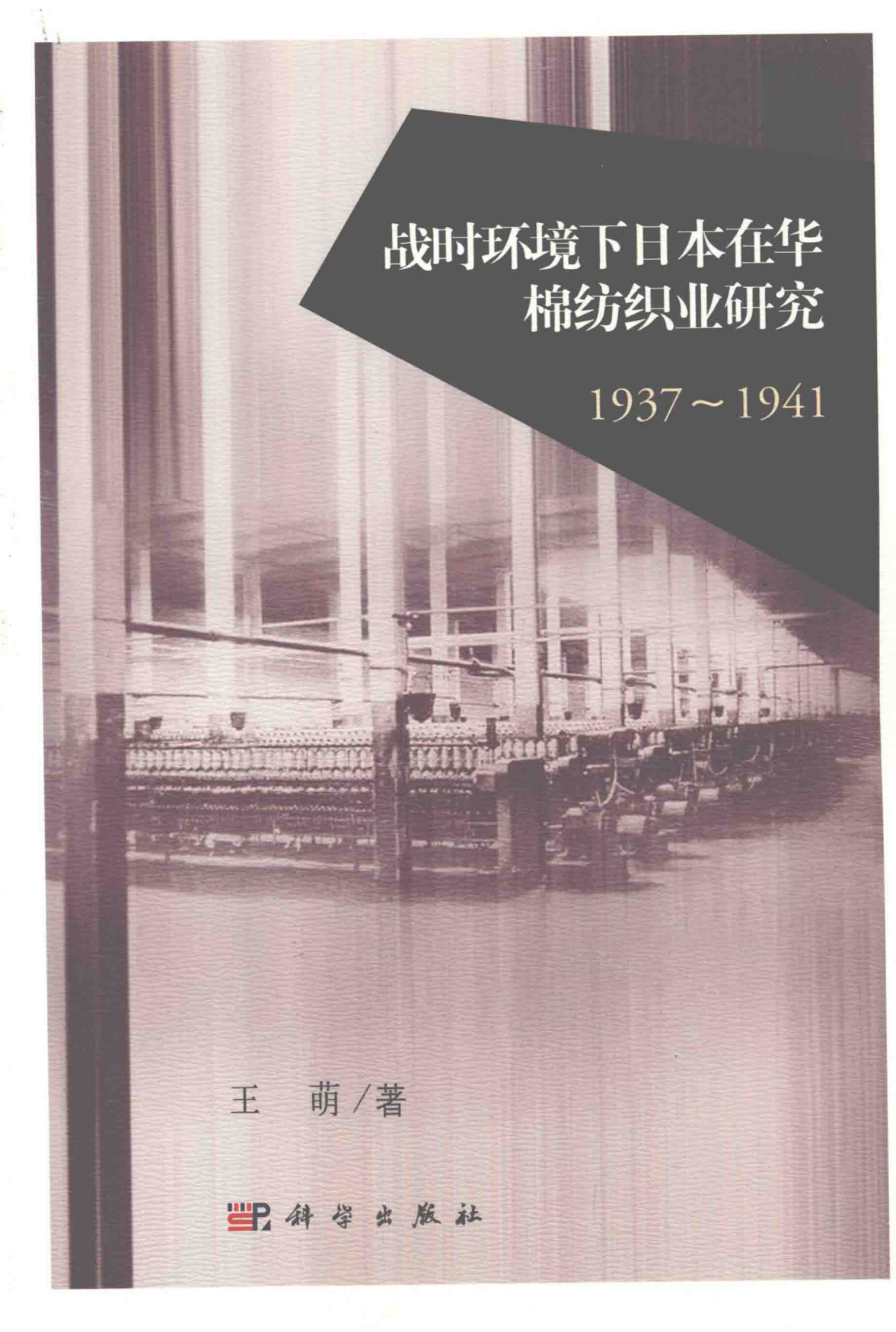




# 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 棉纺织业研究

1937~1941

王 萌 / 著

 科学出版社



# 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 棉纺织业研究

1937～1941

王 萌 /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战时环境下日本在华棉纺织业研究: 1937 ~ 1941/王萌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03-046579-5

I. ①战… II. ①王… III. ①棉纺织工业—对华投资—研究—  
日本—1937 ~ 1941 IV. ①F43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7455 号

---

责任编辑: 杨 静 陈 亮 / 责任校对: 郑金红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3/4

字数: 296 000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绪论

## 第一章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商纱厂的生产经营与扩张

- 第一节 地域与规模 / 22
- 第二节 各社生产特点与经营状况 / 27
- 第三节 生产趋向与生产效率 / 31
- 第四节 原棉采购与消费 / 34
- 第五节 市场与销路 / 40
- 第六节 经营成本 / 48
- 第七节 经营理念与劳资对立 / 49
- 第八节 中日纱厂的对立与协调 / 52

## 第二章 战时日商纱厂的损毁、复兴与再扩张

- 第一节 上海日商纱厂的损失 / 56
- 第二节 青岛日商纱厂的毁灭 / 58
- 第三节 天津日商纱厂扩张计划的夭折 / 61
- 第四节 上海、青岛日商纱厂的复兴计划 / 64
- 第五节 华北华商纱厂的“傀儡”化与“军管理” / 68
- 第六节 华中华商纱厂的“中日合办”与“委任经营” / 73
- 第七节 日商纱厂对华商纱厂的接管过程 / 77

第八节 日商纱厂对华商纱厂的经营与返还 / 82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89

### 第三章 对战时上海日商纱厂市场销路与生产经营的考察

第一节 淞沪会战前日商纱厂市场销路的动向 / 92

第二节 战时日商纱厂市场销路的沉寂与复苏(1937.8—  
1938.9) / 95

第三节 市场销路的低迷、和缓与高涨(1938.10—1939.5) / 102

第四节 市场销路的繁荣与饱和(1939.6—1940.4) / 107

第五节 市场销路的衰退与没落(1940.5—1941.12) / 110

第六节 客帮对日商纱厂销路的影响 / 114

第七节 沪上同业对日商纱厂市场的影响 / 118

第八节 市场销路对日商纱厂生产经营的影响 / 120

第九节 本章小结 / 128

### 第四章 日商纱厂与原棉问题

第一节 战前全国棉产的好转 / 131

第二节 日军华北棉运出、配额统制对日商纱厂的影响 / 134

第三节 日商纱厂对日军华北棉收购、增产统制的协助 / 139

第四节 日商纱厂对华中棉的采购与吸收 / 145

第五节 上海外棉进口与日商纱厂的消费 / 153

第六节 通货变动对日商纱厂外棉采购的影响 / 157

第七节 战时原棉问题与日商纱厂的应对 / 160

第八节 本章小结 / 162

### 第五章 上海日商纱厂与日本在华中的军票工作

第一节 上海日商纱厂与军票工作之结合 / 167

第二节 “伊资金”的启动 / 171

第三节 “K资金”的设立 / 175

|     |                      |   |     |
|-----|----------------------|---|-----|
| 第四节 | “C资金”的出台             | / | 178 |
| 第五节 | 日军“军票经济圈”的推行与日商纱厂的困境 | / | 182 |
| 第六节 | 本章小结                 | / | 186 |

## 第六章 日商纱厂与劳工问题

|     |           |   |     |
|-----|-----------|---|-----|
| 第一节 | 劳工数量与雇佣状况 | / | 192 |
| 第二节 | 劳动时间与薪酬津贴 | / | 197 |
| 第三节 | 管理体系与劳动效率 | / | 202 |
| 第四节 | 宿舍条件与生活设施 | / | 207 |
| 第五节 | 社内组织与劳工运动 | / | 209 |
| 第六节 | 惩罚制度与退社情况 | / | 213 |
| 第七节 | 本章小结      | / | 216 |

## 第七章 总论——兼论日商纱厂对战时环境下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

|     |                     |   |     |
|-----|---------------------|---|-----|
| 第一节 | 解题                  | / | 222 |
| 第二节 | 日商纱厂与战时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的关系  | / | 223 |
| 第三节 | 日商纱厂与抗战中国的关系        | / | 228 |
| 第四节 | 日商纱厂的兴衰与日本军国经济体系的关系 | / | 232 |

## 参考文献

## 附录

|     |    |   |     |
|-----|----|---|-----|
| 附录一 | 附文 | / | 247 |
| 附录二 |    | / | 253 |

## 后记

# 绪论

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对华实业投资集中于两支：一为东北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二为日本在华的庞大棉纺织业，一般日本学界称其为“在华纺”的日商纱厂集团。“满铁”作为日本政府直接控制下的企业，它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于为日本国家机器服务，因而“满铁”的经营可以不在乎成本与经济效益。与“满铁”不同的是，日商纱厂作为日本棉纺织资本在华投资的“果实”，则更具民间资本的色彩，它的存在价值则是谋求日本纺织资本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日商纱厂自诞生以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力、丰富的棉产资源与广阔的国内市场，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取了巨大的利润。日商纱厂虽然是日本的资本工业集团，但它的活动始终与中国紧密联系。关于日商纱厂的研究，虽然是日本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课题，但是研究的舞台却主要在中国。

日本近代对华棉纺织业的投资，肇始于 1895 年中日两国签订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并进口各种生产设备，从而为日商纱厂的兴办提供了法理基础与条约依据。自 1902 年第一家日商纱厂“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开办以来，随着日本在华军政势力的不断膨胀，日本纺织资本家陆续来华办厂置业。经历了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和后期两大黄金发展阶段，至 1937 年 6 月末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日商纱厂已在上海、青岛、天津、汉口等地形成 13 家企业、48 家工厂，拥有纱锭 240 万枚、织机 35 万台，雇佣 10 万中国劳工的庞大生产规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商纱厂受战事影响，在生产规模上有所变动。1940 年年末，全国日商纱厂的纱锭总数为 220 余万枚，织机为 41 万余台，雇佣中国劳工近 5.5 万人（尚不包括“委任经营”、“军管理”下各华商纱厂设备数、劳工数），与战前相比，虽然战时日商纱厂在设备总量上无明显变化，但在劳工雇佣人数上却大幅减少。在生产经营上，天津日商纱厂因受华北日军棉花统制的影响，自 1938 年年末后生产逐渐不振；青岛日商纱厂因国民党军队的

彻底爆破而无法恢复战前的实力，1939年5月复产以来生产状况不佳；只有上海日商纱厂不仅生产设备在战事中较完整地保留下来，并且维持着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成为抗日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生产的主力军。1938年10月—1940年4月，上海日商纱厂基本维持了近100%的生产率，保持着旺盛的生产态势。然而，1940年10月上海日商纱厂宣布全体减产50%，其生产从此走向衰落。抗日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

此外，日商纱厂自诞生以来，还逐渐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在战时环境下仍得以体现。

（1）日商纱厂与日本各时期的对华政治经济政策，持亦步亦趋之态度。日商纱厂的扩张，是依附于日本在华军政势力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商纱厂集团曾称：“我在华棉纺织业已与满铁一样，在日本的对华工业投资中占有指导地位，成为了我国对华经济的主干。然而我们的经营活动常常受中国的政情乃至中国当局政策动向的极大影响，故而必须站在与日本对华政策保持密切联动的立场。”<sup>①</sup>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商纱厂公开宣布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支持，公大纱厂的母体钟渊纺织会社于淞沪会战爆发前的1937年8月10日，曾发表《中日需要全面决战》称：“战士牺牲在战场，产业人殉职于产业战线，若有此种觉悟，百亿日元又何足挂齿，需要的反而是拼命的努力，这才是产业人肩负的重任。我钟渊的信条是通过所从事的事业，为国效劳，我社对在增加国富、支付经费中承担一部分责任，应该感到这是无上光荣的。”<sup>②</sup>战时，日商纱厂对日本军政当局在华北、华中实施的原棉、通货、封锁政策均有配合或援助，充当日本对华侵略的羽翼。

（2）长期以来，日商纱厂间形成了卡特尔式集团性。经历了一个自由发展阶段，日商纱厂，为了彻底垄断中国棉产品市场，获取更高额的利润，各家企业之间于1925年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同盟性质的卡特尔行业协会——在华日本纺织联合同业会（以下简称“同业会”）。该组织对外代表日商纱厂与中日政府进行各种交涉，对内调控日商纱厂的生产效率，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同业会总部设于日本大阪，另设上海、青岛、天津、东京等各支部，大阪总部定期召集各企业的生产代表，制订日商纱厂各项生产经营计划。虽然日商纱厂各家会社在常规生产、商业活动乃至法人代表上具有独立性，但

① [日]在华日本纺织同业联合会编：《船津辰一郎》，东京：东方研究会，1958年，第175页。

② 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拘留民（1868—1945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188页。

在生产经营等重大决策上均须听命于同业会大阪总部的指导。各家日商纱厂与同业会的组织隶属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家日商纱厂与同行会的组织隶属关系

|         |      |                |
|---------|------|----------------|
| 同业会大阪总部 | 上海支部 | 大康纱厂           |
|         |      | 同兴纺织株式会社       |
|         |      | 公大纱厂           |
|         |      | 内外棉株式会社上海分厂    |
|         |      | 日华纺织株式会社       |
|         |      |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       |
|         |      | 振华纺织株式会社       |
|         |      | 东华纺织株式会社       |
|         |      |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       |
|         |      |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       |
|         | 青岛支部 | 同兴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 富士瓦斯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工厂 |
|         |      | 公大纱厂青岛分厂       |
|         |      | 国光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 日清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 内外棉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 大康纱厂青岛分厂       |
|         |      | 丰田纺织株式会社青岛分厂   |
|         | 天津支部 | 公大纱厂天津分厂       |
|         |      | 岸和田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分厂  |
|         |      | 双喜纺织株式会社       |
|         |      | 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分厂   |
|         |      | 天津纺织株式会社       |
|         |      | 唐山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         |      | 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分厂   |
|         |      | 裕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
|         | 汉口   | 泰安纺织株式会社       |
|         | 东京支部 | 无隶属工厂          |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业会对纱厂的控制进一步强化，同业会对纱厂原棉

价格的协定、统一减产计划的实施,乃至与军部的谈判,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指导战时日商纱厂各项活动的灵魂。

(3) 日商纱厂对中国社会的多种影响。在经济层面上,日商纱厂与中国的商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日商纱厂生产的大量棉产品通过洋行、客帮流入全国各级市场,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渠道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日商纱厂为各时期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例如,1931年,日商纱厂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达成协议,每年缴纳约800万日元的棉纱统税,这笔税款成为战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来源之一,同时也是日商纱厂利用其制约国民政府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商纱厂为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维新政府”与汪伪政权缴纳大笔统税,日商纱厂的税款维持了南北伪政权的基本财政运转。在社会影响上,日商纱厂的生产活动与中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存在联系,1925年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以及1936年上海、青岛棉纺织劳工发起的大规模罢工,均因日商纱厂内部的劳资纠纷而起。抗日战争前期,虽然日商纱厂劳工受到驻厂日军的严密监控,然而日商纱厂仍是中共及各种社会势力进行渗透、宣传政治主张的重要阵地,日商纱厂内的劳资对立始终尖锐,工人运动时有发生,战时日商纱厂制定的诸项劳工政策,对劳工的生存状态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到,长年立足中国的日商纱厂集团,并非仅仅是一些单纯从事棉产品生产的纺织企业,它们的经营、生产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且广泛的影响。对日商纱厂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领域必须面对并探讨的课题。

中外学界历来不乏对这个经济实体的研究,然而研究现状中却存在一个奇特的现象:对于1937年抗日战争之前各时期日商纱厂活动的研究,正如下文第二章所述,已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境界,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日商纱厂活动的研究,则处于较薄弱的阶段。因而,笔者希望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也即相当于中国抗日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活动为研究对象,针对以上研究现状中的薄弱环节,在明晰史实的基础上开展详尽的研究。笔者的研究动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①这一历史时段日商纱厂的史实研究仍存在较多空白,诸多细节仍需要确认或重述,具体而言,这些尚不明朗的细节主要体现于日商纱厂的规模扩张、销路变动、原棉采购,与日本战时通货政策的联系及社内劳工动向等问题之中,一些已有的研究视角仍具有拓宽的必要,一些研究的结论也需进一步深入或完善。②笔者希望通过厘清以上史实,探讨作为立地中国的外资企

业——日商纱厂在战时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究竟是如何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即在日军以武力介入中国自由经济的市场，中国棉纺织业整体衰退的战时环境下，日商纱厂究竟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维持它的经济生命的？它的产品又是利用怎样的渠道流向全国各地的？它的生产经营又受到了哪些力量的制约？这些问题最终汇成了笔者的这本著作最关注的问题，即在战争大环境下，究竟是什么因素带给了日商纱厂战时的兴盛繁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生产上的急剧衰落？<sup>①</sup>通过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解答，笔者还将进一步思考一个更为宏观的问题：日商纱厂作为一项日本商人投资的海外经济事业，与战时的日本军国经济体系又存在怎样的联系？

总之，如何利用好关于日商纱厂的各种资料，尽可能地还原出历史的真相，运用数据统计等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开拓中外学者尚未充分关注或完善的视角，是本书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通过对战时环境下日商纱厂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的剖析，厘清它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日本军国经济体系存在的内在联系，才能洞悉日商纱厂由盛转衰的真实原因。

此外，本书以1937—1941年抗日战争前期这一时段为研究时限，不仅因为1937—1941年与1941—1945年日商纱厂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因为这两个时期日商纱厂自身生产活动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1937—1941年，日商纱厂在诸方面虽也受到来自日本军政当局的一些经济统制，然而因立地中国的特殊性，其所受统制的强度与经营主体性之间仍具有一定的弹性与张力。抗日战争前期，上海还存在着不同于青岛、天津等地的局部安全的市场环境 with 允许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日商纱厂最大的竞争对手——华商纱厂，不仅未在战火中彻底崩溃，反而得以利用上海特殊的租界环境、劫后残余的生产设备，与日商纱厂共同创造了战时上海棉纺织业的繁荣。日商纱厂与华商纱厂在棉产品市场上虽然存在激烈的竞争，然而因客观环境、销路、市场的变迁，这种竞争已与战前的竞争完全不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时代结束，华商纱厂的实体为日本军政势力彻底控制，外棉经由上海进口的渠道基本断绝，以租界为中心的棉产品自由市

① 通过阅读有关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的相关史料，可以看到以上海日商纱厂为主体的日本棉纺织业1939—1940年在生产经营、市场销路上均出现了繁荣，但在1940年10月以后却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衰退，青岛、天津日商纱厂则于更早的1939年年初，即已出现了生产经营衰退的迹象。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原棉供给上的缺乏，该观点参见〔日〕桑原哲也：《日商纱厂的组织经营能力——两次大战期间的内外棉会社》，《经营学论集》2004年1期。然而笔者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解读，发现这一结论仍有商榷的余地。

场不复存在。1941—1945年，日商纱厂受到来自日本军政当局最为严厉的统制，经营主体性基本丧失。对战争后期日商纱厂活动的研究，虽然亦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必须建立在对战争前期情况充分把握的基础之上，若不能明确战争前期日商纱厂活动的基本情况，当然无法深刻理解战争后期其受日本军政当局彻底统制的背景，因而对于抗日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研究，实际上应视为研究其抗日战争后期活动的重要先行研究。

我们认为，研究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活动，也并非仅仅关注这一时段之动向，历史研究的连贯性往往被人为的意识所阻隔与割裂，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事实上，战前日商纱厂生产经营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如社内劳工问题、传统销路问题等，仍对战时日商纱厂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故而在研究战时日商纱厂的活动之前，我们必须对战前日商纱厂的生产情况有所了解。恰恰是在战时环境下，日商纱厂生产经营上的一些问题得以暴露，其生产经营与日本军政当局的政策产生矛盾。观察战前与战时日商纱厂在生存状态上所发生的变化，使我们更能客观地理解日本在华棉纺织资本与日本国家战争机器之间微妙的关系。在这一研究思路的指引下，笔者希望以更为宽阔的视野去认识和理解抗日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活动，并深入体察其所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之前，中外学者关于日商纱厂已有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建立在丰富的文献搜集与广泛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中国学者王子建的《七省纱厂调查报告书》（1933年）及《日本棉纺织工业》（1933年）、方显廷的《中国之棉纺织业》（1934年）、金国宝的《中国棉业问题》（1936年）等论著，都对当时日商纱厂的诸多生产经营有所关注，这些中国学者充满着时代的忧患意识，侧重批判日商纱厂活动的经济侵略性。而当时日本学者或日本经济研究机构，如马场敏太郎的《中国之棉业》（1924年）、滨田峰太郎的《在华纺织业》（1924年）、内山完造的《我国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变迁》（1924年）、大阪屋商店调查部主编的《在华纺织小史》（1930年）、东亚经济调查局编的《中国纺织业的发达及其未来》（1932年）、大山寿的《关于我国纺织业的调查》（1935年）、冈部利良的《在华纺织业的发展及其基础》（1936年）、在华日本纺织同业会编的《由日商纱厂纺织企业进入所带来对中国纺织企业的影响》（1936年）、名和统一的《日本纺织业和原棉问题研究》（1937年）等，从调查日本在华产业经济实态的角度，对当时作为“邦人企业”的代表——日商纱厂的经营规模及生产状况，进行过大量细致的研究。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5年战争结束，在此期间中外学者对日商纱厂活动的研究并未间

断，中国方面则有严中平的《中国棉业之发展》（1943年）等；日本方面则有国松文雄的《中国棉花之问题》（1938年）、满铁调查部编的《日本纺织资本与中国》（1939年）、大日本纺织联合会主编的《东亚共荣圈与纤维产业》（1940年）、樋口弘的《日本的对华投资》（1940年）、宇佐见诚次郎的《纺织资本的对华输出》（1940年）与《日商纱厂织业的发展和外国资本》（1941年）、野口保一郎的《关于大东亚共荣圈的棉花问题》（1943年）等，他们的研究对战前的研究有所补充与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个别欧美学者亦关注中日棉纺织业的变迁，如Pearse的《中日两国的棉纺织业》（*Cotton Industry of Japan and China*, 1929年）等著作，对于了解当时日商纱厂的生产活动也有一定的裨益。1945年前中外学者对日商纱厂的研究，或勾勒出日商纱厂与华商纱厂在生产效率上的区别，或说明日商纱厂与日本国内棉纺织业在竞争上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研究优势在于大量使用了当时公开的政府文书所提供的数据与资料，使后人对日商纱厂这一经济实体的发展脉络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然而，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局限：由于几乎没有完整地使用日商纱厂企业内部的档案文书，故而无法精确地估算出企业所取得的真实效益与利润，不过他们的研究成果仍使我们得以较客观地了解战前日商纱厂一些生产经营上的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外学界关于日商纱厂的研究成果可谓迭出。日商纱厂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的视角不断开阔，史料收集渐成体系。在各国的研究队伍中，以日本学者为首的“在华纺”研究队伍最具规模。此外，在中国、韩国、欧美等学界，亦不乏关心日商纱厂问题者。日商纱厂研究队伍的壮大，既说明了日商纱厂研究具有生命力，也说明了它仍是研究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领域的重要选题。战后，学界对日商纱厂的研究视域大为开阔，不同专业研究背景的学者皆可探讨日商纱厂各方面的课题。日商纱厂研究队伍的最大变化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商纱厂仅是经济学家、纺织专家关心的对象，而战后，历史学家也开始对其产生兴趣，关于日商纱厂各种活动史的研究兴起。在史料收集上，与日商纱厂相关的资料大量涌现，不仅战前丰富的棉纺织业报刊、研究报告可供学者利用，且诸多当时日商纱厂经营管理者的回忆录、日记也陆续问世，从中可以了解一些重要相关经济人物的经营思想。值得庆幸的是，部分日商纱厂内部的档案资料虽于战火中焚毁、遗失，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得以保存，它们成了研究日商纱厂生产经营问题的第一手史料。在此基础上，战后关于日商纱厂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

以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商纱厂的研究以日本学界为大宗。日本学界经历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漫长的历史认识的积累,在资料收集、史实判明、理论运用上都展现出充分优势。战后,饭岛幡司、三瓶孝子等纺织史专家将日商纱厂的发展史纳入日本纺织史的范畴加以书写,尚不能脱离纺织史研究的窠臼。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一些关于日商纱厂的专题性、宏观性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其中的代表作品为副岛圆照的《日本纺织业和中国市场》(1972年)。副岛圆照在文中基本厘清了日商纱厂形成初期与日本纺织业之关系,他将日本棉纺织业产品和资本的对华输出,称为“不可避免地担当了日本侵略尖兵的角色”,这与抗日战争前中国学者严中平等人对“日商纱厂”的定义如出一辙。与副岛圆照的研究成果交相辉映的另一重要论文,为竹本晃的《日商纱厂的发展和背景,1914—1937年》(1976年)。竹本晃利用原日本纺织联合会编撰的历年《棉纱纺织事情参考书》的生产数据,将日商纱厂与日本国内纱厂不同时期的纯利润率进行了比较,得出“日商纱厂与国内纱厂织企业相比,在经营上取得了更为有利的成果”的结论,此外,竹本晃还将日商纱厂按照不同资产规模进行分类,分别统计出各家企业的利益率在不同时期的盈亏走向。更有意义的是,竹本晃还将日商纱厂与日本国内纱厂、华商纱厂在技术、组织、资本积累能力、军事力量支援等各项内外条件进行逐一对比,分析了日商纱厂所具有的优势,说明了它与后两者在市场、生产上得以抗衡竞争乃至超越的事实。此外,清川雪彦的论文《日商纱厂在中国棉工业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1974年),则指出了日商纱厂的先进纺织技术在客观上起到了带动中国华商纱厂技术整体升级的效果,清川雪彦尤其对上海日商纱厂在生产技术上的优越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虽然副岛圆照等人的论文仍以经营活动为视角,但对于我们掌握战前与战时的日商纱厂所达到的规模和生产水平,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另外,一些关于日商纱厂的区域性研究也在展开,如山崎弘明的《关于战时华北日本纺织会社经营动向的备忘录》(1977年)等成果,为我们了解战时华北日商纱厂生产动向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材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关于日商纱厂的研究硕果累累。以高村直助、杨天溢、桑原哲也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其研究体现出一个总的趋向,即将日商纱厂研究作为近代日本经济侵华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来加以研究,这一研究理念在学者们的史料择取上有充分体现。高村直助等人认为,日商纱厂作为日本棉纺织业的在华前哨阵地,通过生产棉产品并将之在中国市场上销售,获取了庞大可观的利润。从1902年第一家日商纱厂上海纺织会社诞生,

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16家日商纱厂企业为国民政府中纺公司接收为止,日商纱厂被视为日本棉纺织业在华的分身,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实行经济掠夺的手段之一,日商纱厂的存在严重压制了中国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华商纱厂的生存空间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高村直助等日本学者将日商纱厂的活动定性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重要一环。这种定性式的研究在高村直助的《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1982年)、杨天溢的《在华日本棉纺织业(日商纱厂)与华商纱厂的相克》(1982年)、桑原哲也的《在华纺的兴衰——国家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内外棉》(1997年)和《在华纺的组织能力——两次大战之间的内外棉株式会社》(2004年)等论著中均有所体现。从史观而论,这一代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向,往往不自觉地将史料迁就预设的观念框架;从研究内容而论,日商纱厂活动史的研究仍主要局限于生产经营史的范畴,日商纱厂的生产状况、经营效益、盈利情况既是这代研究者的关心所在,也局限了他们的研究视野。在史料运用上,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通过运用各类日文史料,构建了日商纱厂在华活动的历史脉络,然而遗憾的是,中文的相关资料尤其是当时中国的棉纺织业报刊,则择用不多。

近年来,以久保亨、笼谷直人、森时彦为代表的战后新一代学者,已认识到日商纱厂独特的地域性问题,以及日商纱厂的生产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经济环境中所体现的丰富多样性。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社会与市场的极度复杂性,日商纱厂并非仅仅依靠日本军政势力的庇护即可独霸整个中国棉产品市场,日商纱厂不仅面临着中国民族棉纺织业资本的激烈抵抗,且其自身也必须依赖及适应中国市场的各种需求而生存。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商纱厂不仅与中国的华商纱厂对抗日益激烈,而且与日本国内纱厂的矛盾也有所升级。这种对抗与矛盾的体现,在于日商纱厂既具有强烈独占中国棉产品市场的欲望,也具有作为在华企业反对外来进口产品的本能。他们注意到,在原料的吸收上,中国本土棉花的产量与质量对日商纱厂的生产造成了较大的制约,日商纱厂还必须一定程度上依赖外棉进口。为了弥补高村直助等第一代学者对中文资料及一手档案利用的不足,森时彦、久保亨等学者参阅了大量中文文献,将日商纱厂的活动置于整体中国棉纺织史中加以把握,这样的研究思路在森时彦的《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史的研究》(2001年)和久保亨的《战间期中国的棉纺织业和企业经营》(2005年)等著作中有充分体现。尤其是森时彦,还关注了日商纱厂产品在民间的流向与日商纱厂生产经营取向间的联系。同时,在森时彦主编的论文集《在华纺与中国社会》(2005年)中,笼谷直人、岩井茂树、富泽芳亚等通过对日商纱厂生产经营方面的

研究,分析了日商纱厂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力求还原近代日商纱厂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真实存在状态。从他们的成果中可见,这些学者对史料的择取,已开始转向民国时期大量出版的棉纺织业报刊与新中国成立后编写出版的华商纱厂企业史料上,并采用一些相关日本纺织界重要人物,如船津辰一郎、西川秋次、丰田左右吉等人的回忆录与传记,他们广泛运用史料的自信,显然建立在对以往研究视角的拓宽之上。森时彦还继承了高村直助等前辈在日商纱厂生产经营活动上的丰富研究成果,同时展开一系列外延性的研究,他们对日商纱厂活动史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生产经营方向,已拓展至日商纱厂与中日政治、社会、经济关系的探讨上。他们立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宏大视野,阐述了日商纱厂在近代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对日商纱厂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些全新的视角,如笼谷直人的《在华纺在日本棉纺织业中的历史意义》(收入森时彦主编的《在华纺与中国社会》,2005年),通过分析1925年“五卅运动”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日商纱厂所处的与日本国内完全不同的生产环境,指出日商纱厂与日本母公司之间自始至终始存在一种联动的关系。久保亨的《战间期中国的棉纺织业和企业经营》(2005年)则提出了华商纱厂的不同发展类型论与地带构造论。他对严中平所提出的日商纱厂在中国棉纺织品市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之说持否定态度。他指出:“确实从全国统计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日商纱厂在细纱和棉纱市场上占有优势,但是,如果按照不同的地域来分析则未必如此。日本的资本在华北的优势无疑是显著的,但在中国内地它还无法伸入,反而中国资本的势力却可以扩展。如果是上海的话,日本资本和中国资本的势力可谓不相伯仲,但所谓全国范围压倒之说,则极勉强。”<sup>①</sup>总之,这些学者关注日商纱厂所受到的地域影响,认识到日商纱厂与华商纱厂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协调的复杂关系,强调日商纱厂与中国社会及各级市场存在的共生性。

需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外国学者对日商纱厂的研究旨趣,已开始打破利用企业内部档案资料的传统企业史或社会经济史研究模式,逐渐趋向于从国家政治史的角度去分析日商纱厂的活动,如韩国学者金志焕的《棉纺之战——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棉纺织业冲突》(2006年),日本学者富泽芳亚的《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棉纱统税改订问题和中日纺织资本》(1991年)和《棉纱统税的制定与日中纺织资本》(1991年)等,他们为日商纱厂的研究另辟蹊径,尽可能地将日商纱厂诸种活动的历史场景加以还原,多层面地分析

① [日]久保亨:《战间期中国的棉业和企业经营》,东京:汲古书院,2005年,第17页。

日商纱厂与中国国家上层的互动关系。

另外，中国国内学界对日商纱厂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78年以后，国内学界对日商纱厂的研究有所推进。一些学者如赵冈和陈钟毅所著的《中国棉业史》（1983年）、杜恂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1986年）、虞京海的《日本旧上海棉纺织业的投资》（1995年）、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1997年），以及刘敏的《近代日本纺织企业的对华掠夺》（1996年）、近代中国纺织史编辑组等编的《近代中国纺织史》（1997年）、庄红娟的《近代日本的对华资本输出原理——以在华日本纺织业为例》（2005年）等论著，对日商纱厂的资本性质与生产经营问题展开讨论。不过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虽也偶有新意，但大多不脱1949年前严中平、方显廷、王子建等关心的范畴，数据引用上并无很大的创新，其学术成果与同时期日本学者取得的研究成果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研究时限上，中外学者对日商纱厂自诞生至消亡各时期的活动均有涉足，但以20世纪20—30年代的研究最为集中，多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下限。这一时期对应于日商纱厂活动的最活跃期，关于其生产的资料也最为丰富，故相对研究成果也最多，这些都对笔者研究战争前期日商纱厂的活动具有借鉴意义。然而如前所述，由于史料的相对匮乏，对于1937—1941年战争前期的研究在整体日商纱厂研究成果中处于薄弱地位，尤其是在史实梳理、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方法上，均留有相当的空白。笔者可以明显感到，即使是日本学者对于战时日商纱厂的活动，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而这一时段研究的缺失，又与日商纱厂整体研究的强大阵容颇不相称，存在着“厚”战前而“薄”战时的现象。不过，即便是在这一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也并非毫无成果，上文所提到的日本学者高村直助的《近代日本棉纺织业与中国》（1982年），以及中村隆英的《战时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支配》（1983年）、今井就稔的《战时上海敌产处理的变迁过程与日中棉纺业资本》（2005年），另外还有中国学者王子建的《“孤岛”时期民族棉纺工业》（1990年）、史金生主编的《中华民国经济史》（1989年）、居之芬等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1997年）、曾业英的《日伪统制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近代中国纺织史编写组所编的《近代中国纺织史》（1997年）、黄美真等主编的《日伪对话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2005年）、罗苏文的《高郎桥纪事：近代上海一个棉纺织业工业区的兴起与终结（1700—2000）》（2011年）等论著，以及不胜枚举的上海史研究成果中的相关章节，都述及战时日商纱厂的一些活动情况。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